



XIANG NAN BAO DONG

湘南暴动

中共郴州地委宣传部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湘南暴动

中共郴州地委宣传部



徐一霖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

（内部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长沙）

（内部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长沙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湘 南 暴 动

中共郴州地委宣传部

责任编辑：徐日晖

装帧设计：张小平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79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5,000 印数：1—2,500 印张：2

统一书号：11109·129 定价：0.17元

目 录

- 一、不屈的湘南人民..... (3)
- 二、千里转战到湘南..... (8)
- 三、宜章暴动..... (18)
- 四、痛打许克祥..... (24)
- 五、郴州城里红旗扬..... (28)
- 六、攻占永兴..... (32)
- 七、解放资兴..... (36)
- 八、直取耒阳..... (40)
- 九、与工人游击队会合..... (47)
- 十、“反白”事件..... (53)
- 十一、大黄家之战..... (58)
- 十二、奔向井冈山..... (61)
- 十三、伟大的会师..... (66)

一九二八年一月，朱德、陈毅同志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一部分军队进入湘南，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赤卫队的配合下，发动了湘南暴动（也称年关暴动）。从这时起到四月这支队伍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会合止，这短短的三个月内，工农革命军由一千多人发展到一万多人，建立了宜章、郴县、永兴、资兴、耒阳五县的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风暴遍及汝城、桂东、安仁、临武、桂阳、酃县、常宁等县，约一百多万人参加了起义，声震全国，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光荣地载入我党我军史册。

湘南暴动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影响和鼓舞下，总结南昌起义和海陆丰、广州起义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的。它是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坚持农民武装割据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它为我党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的理论，就是总结了秋收起义和湘南暴动以及湖北黄安等地农民武装割据的经验，发展丰富起来的。

湘南暴动巩固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开辟的中国

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发展壮大了毛泽东同志创立的第一支工农革命军，是继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伟大实践之后的又一次实践，对于影响和鼓舞全国建立发展农村根据地，对于由城市起义转变为农村起义，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对于壮大人民军队，对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都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对于湘南暴动和井冈山会师曾给予高度的历史评价。他在一九七一年二月针对林彪一伙对历史的歪曲和篡改，曾明白指出：“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华国锋同志在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上的悼词中指出：“一九二八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从此，朱德同志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湘南暴动将永远是我国革命的光辉篇章，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功勋将世代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将激励后代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献身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向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进军。

一、不屈的湘南人民

湘南包括湖南省现在所辖的郴州地区的十一个县和一个市以及零陵、衡阳、湘潭地区的部分县、市。它一半是丘陵，一半是山区，南接广东，东邻江西，距革命摇篮——井冈山很近，桂东、酃县就在井冈山的西边山麓。京广铁路未修成时，有湘粤大道直贯其中，是南北交通的要冲。这里的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痛苦不堪。但他们勇敢，勤劳，富有斗争性，从一九二一年，特别是大革命时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与敌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湖南党的组织成立后，不久就在衡阳建立了地方委员会（后改称湘南特委），随后，湘南各县县委也陆续建立起来，领导着各地人民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二六年春，湘南农民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各县农民秘密串连登记造册，秋后，县、区、乡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队纷纷成立，清算了土豪劣绅的财产和他们所把持的地方公款，追缴了他们的田契，其态度恶劣者，则挂上牌子游村示众，

把他们昔日的威风，斗得扫地以尽。汝城县的恶霸地主曹裕民，以放债起家，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剥削农民稻谷达六百多担。农民协会提出“禁止高利重剥”的口号后，他慌忙把几百担谷子分散到各地藏匿起来，农民协会便发动农民把他在各地的谷仓贴上封条，并告诫他，须俟清还其高利盘剥后才准开仓。此时这个恶霸才赶紧去农民协会拱手认错，并拿出三百担谷子作退还高利之用。

农民运动势如暴风骤雨，锐不可挡；地主豪绅胆颤心惊，寝食不安，有的逃到长沙、广州或上山躲起来了。有的县长大人，也不得不老老实实脱下鞋袜，穿上草鞋，戴上斗笠，下乡去与农民打交道。

在农民运动高涨的同时，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商民、学生运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工会、商会、妇女联合会、学生会都相继成立，这些组织培养了不少有觉悟、有能力的干部，这些干部后来为革命事业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面对日益高涨的群众革命运动却吓慌了手脚，叫喊运动过火了。一九二七年四月，人民公敌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五月二十一日湖南何键、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湘南的反动派公开组织“清

“党委员会”、“救党会”、“挨户团”等反革命组织，向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扑。他们到处“围户搜山”，不少优秀的共产党员、工农运动骨干和革命家属惨遭杀害，一些地方党组织被破坏，群众组织被摧毁。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城乡。

反动派在政治上疯狂地对革命人民进行镇压，在经济上对人民则实行更加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他们的税局遍布各地，关卡林立，捐税多如牛毛。农民除了要缴纳正赋外，还要缴纳团款附加、公路款附加、学款附加等各种各样的附加税，这一年的附加，有的地方达到了正赋的五点六倍。当时有人写了这样一首歌谣：“税局、赌局、洋烟局，局又分局，局内者甘，局外者苦，何日了局得太平。”对反动政府的敲榨勒索，聚敛财富，表示十分愤慨。此时，地主豪绅重新跳了出来，向农民反攻，原来农民协会颁布的减租减息法令被取消了，地租一升再升，一提再提，田里收入一担，东佃各提一箩还是寻常之事，有的甚至倒“四六”开，倒“三七”开，有的一亩田佃户竟要缴纳租谷六百斤。高利贷亦是惊人的，年利率达到了百分之四、五十，甚至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百。地主豪绅还肆意处分农民，耒阳县竹市凡是在大革命时期背过梭镖的，每人被罚款五至十元。

湘南人民在白色恐怖之下，并没有屈服。他

们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继续坚持地下斗争。经过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特别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奔上井冈山以后，湘南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更为高涨，到处组织了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活动。

各地游击队都是以当地的党员、农运干部、积极分子和青年农民所组成。他们以鸟铳、大刀、梭镖、篾刀、斧头、棍棒等为武器，向反动派展开了有力的反击。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六日，郴县游击队在良田高鸦岭袭击了大地主陈治奎的窝巢，因陈治奎逃逸，游击队便处决了陈的父亲陈世泽和一个罪大恶极的当家先生，解放了陈家的丫环、婢女、佣人，没收了陈家的财产，分给了贫苦农民。

耒阳的游击队提出了“先杀土豪劣绅，后杀反动军警，杀尽反动军警，再杀挨户团丁”的口号，这个口号虽然强调了恐怖手段，从策略上说也是不妥当的，但是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它却起了壮大自己声威、震慑敌人凶焰的作用。那时反动派每天每晚在城区的东、南、西、北四门惨杀革命同志；游击队则每天每晚在四乡捕杀土豪劣绅和反动分子。挨户团有的被消灭，有的被冲散，游击队夺得了一些枪枝，武装了自己。

这个县的县委书记邓宗海同志领导的游击队

是一支非常活跃的队伍。十月间的一天晚上，这支二百多人的队伍从耒阳的春江铺一直游击到郴县。沿途他们张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把电杆砍光，电线剪断，捕杀了三顺庙和元子山两个挨户团的一些首要分子，又在余庆圩打开了一个官方粮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

游击队在对敌斗争中迅速成长壮大，为迎接第二次革命高潮的到来，作好了充分的武装准备。

二、千里转战到湘南

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揭开了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起义军南下后，由于主客观方面的许多原因，其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当时留在三河坝监督梅县方面敌人的起义军的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的同志，在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下，与敌钱大钧部的两个多师激战三天三夜，予敌以重创后，由七十五团掩护，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日撤出三河坝，沿韩江以西的闽粤边境南下，原拟赴潮汕地区与起义军主力部队会合，行至饶平时，遇到从潮汕方面突围出来的二十军部队几百人，方知潮汕失败，乃将伤病人员交给饶平地方党组织分散安置后，与从潮汕撤出的部队会合，将近二千五百人，顶着滚滚乌云，撤出广东，向西北方面转移。

部队在地方党组织的协助下，经大埔、蕉岭、峰市到达福建的武平，在武平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狠揍了尾追的钟治奎部队，然后进入江西境内。在进军路上，国民党调动了大批反动军队和地主武装进行疯狂的追堵和袭扰，加上部队的给养得不到必要的补充，当时已是深秋天气，穿

的仍是夏装，白天经常吃不上饭，晚上没有地方宿营，病号不断增加，而又缺乏医药。部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战士们惴惴不安，思考着往何处去的问题。严酷的现实在考验着每一个人。有的人动摇了，离开了队伍。在这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朱德、陈毅同志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举继续战斗的旗帜，率领部队边打边走，并耐心地做思想政治工作，给大家讲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光明前程。

部队经过筠门岭，到达安远县的天心圩。傍晚，朱德、陈毅同志召集排长以上军官会议，会上，朱德同志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不为困难所屈服。他说：现在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要革命的跟我们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他坚定地表示，只要队伍里还留着一个同志，他就要跟这个同志一起干；如果这个同志也走了，他还会发动别的同志一起来干。接着，他把中国的革命比作俄国的革命。他说：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天空是黑暗的，但是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光明终于来到了。中国革命现在虽然失败了，天空也是黑暗的，但是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光辉灿烂的“一九一七年”的。

只要有人，革命的成功就有希望！他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卓有预见地指出：蒋桂战争一定要爆发的，蒋冯战争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军阀不争地盘是不可能的，要争地盘就要打仗。现在新军阀也不可能不打。他们一打，我们就可以发展了。

陈毅同志也恳切地对大家说：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大家要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要做失败时的英雄。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这次会议后，很多同志增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而当时担任副连长的林彪，到后来却开了小差。当部队离开大庾县城的那天，他伙同几个动摇分子于当晚离开部队向枚英方向逃跑，只因为地主挨户团把守关口甚严，林彪走投无路，才被迫于当夜返回部队。

部队离开天心圩后，仍沿着赣南的山道向西进发。由于部队的成分比较复杂，一部分人身上还存在着旧军队的坏作风，一路上损害群众利益，甚至敲诈勒索，抢劫财物的事件时有发生。由于原建制多已失去组织领导作用，有的军官思想顾虑很多，不敢过问，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以致这些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日益严重。部队进入信丰城后，竟发生了一起由几个不良分子鼓动部分战士抢劫一家当铺的事情。朱德、陈毅同志得知此

事后，立即把队伍拉出城外，在一个山坳里，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会上，陈毅同志对违犯纪律的战士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告诫大家，这种行为是与我们共产党的性质不相容的。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必须严格遵守革命的纪律，否则是不可能战胜敌人，发展自己的。这次大会，大长了革命的正气，刹住了破坏纪律的歪风。会后，部队在信丰县整编为一个团，朱德同志任团长，陈毅同志任党代表，王尔琢同志任参谋长。

十月底部队到达大庾县。在这里，为加强党的领导，成立了党支部，对党团组织进行了整顿，把党团员（当时共约五、六十人）分配到连队，加强了党在基层工作的领导。同时，朱德、陈毅、王尔琢同志经常对党团员进行革命纪律和革命前途的教育，要他们主动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协助组织切实掌握好部队。这时，部队虽然在人数上减少了一半多，只剩下七、八百人，但政治素质提高了，队伍更加纯洁了，成了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终于经历了最艰难的阶段，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当时，粤桂战争爆发，反动派之间发生了狗咬狗的斗争，广东和江西的大小军阀都纷纷卷入了这场混战，一时腾不出力量来追击起义军，部队乃暂时停住了脚，于十一月初，在大庾、崇义、

上犹进行休整。队伍由团改编为纵队。朱德同志任司令，陈毅同志任纵队指导员，王尔琢同志任参谋长。纵队下分三个支队，每个支队设党代表一人。支队下分大队、中队和班。此时部队又吸收了几百名要求参军的钨矿工人和农民，并收回二百多名因离队后找不到出路，而重新要求归队的人。经过整顿，组织健全了，队伍壮大了，战斗力加强了。

十一月上旬，朱德、陈毅同志率部进入湘粤赣三省交界的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打走了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的武装，控制了整个山区。同时调整了原设的税卡，解决部队给养问题。部队一面进行政治军事训练，一面向农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深入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组织群众斗地主豪绅，分粮食财物，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了，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支持和配合，局面显著好转。

这时，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因在大汾遭敌袭击，与毛泽东同志失掉联系，转移到了桂东。朱德、陈毅同志闻讯，当即派人前往桂东联系。这支部队在营长张子清和副营长伍中豪的带领下，通过朱德同志的关系，在桂东县城驻下来了。当时在湘粤赣边的我军部队还有驻在广东乐昌县的一九二七年秋由汝城、宜章农民

组成的第二师第一团。这三支武装给养都很差，枪枝弹药都缺乏。根据这种情况，朱德同志运用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三大”所阐述的关于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中共中央关于利用军阀矛盾的指示精神，同陈毅、王尔琢同志商议后，决定利用范石生的云南军与蒋桂系军阀的矛盾，同范石生搞反蒋统一战线。当时范石生的部队驻扎在广东的韶关和湖南的汝城、资兴一带。朱德同志利用与范石生曾是云南讲武堂同学的关系，亲自带了一支五、六十人的小部队，去汝城找范石生。部队到达离汝城县城七十余里一个叫壕头圩的地方宿营，遇到何其朗土匪武装的偷袭，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朱德同志不顾个人的安危，沉着地指挥部队突围后，敌人已冲到眼前，他急中生计，从厨房里顺手拉了一条炊事员的围裙系在腰上，敌人把他当作伙伕头，这才脱了险。朱德同志与突围出去的同志汇合后，带领部队到达资兴，通过我党在范部的关系，与范谈判，在“部队编制、组织不动，要走随时就走”等条件下，达成了暂时联合的协议，部队换上“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〇团”的番号，朱德同志化名王楷，任十六军总参议、四十七师副师长、一四〇团团团长。为了保持我军的独立，在十六军内秘密成立了中共十六军军委，由陈毅同志任书记。这样，